

论理论批评

陆 扬

摘 要 理论批评以广义上的文学理论为叙述和描述对象。理论本应高屋建瓴，但如一些批评家所言，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文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恰恰是在传布怀疑主义。理论与批评经常被视为一途有特定的时代原因，但是如保罗·弗莱所言，两者毕竟大有不同，文学批评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文学理论恰恰是缺失的。乔纳森·卡勒在理论批评中异军突起，其对理论的热情一如既往，如果说他当年的《论解构》是为德里达解构主义这一新潮理论做普及示范，那么到 2007 年的《理论中的文学性》，毋宁说是在理论联手批评经历峰回路转之后，重申它舍我其谁的王者风范。对理论的质疑事实上与理论的一路高歌同步。卡勒本人对克纳普理论批判的质疑，应是再好不过说明了这一点。“理论”历经浴火后，建立“理论批评”这样一门与实践结合更为密切的关于理论本身的学科，当不是奢望。

关键词 文学理论 理论批评 理论的终结 卡勒 克纳普

作者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11-0121-08

一、一如既往的理论热情

“理论批评”这个术语可以指一切以“理论”为题的相关描述和叙述，这些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元理论”。不过理论批评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更谈不上标新立异。“理论”一语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叶开始，就涵盖和交叉意指“批评”，变成高架在文学头顶上空的形而上学。但随着当时流行的后现代话语淡出视野，曾经风光十足的理论一样开始呈现危机。一时间“理论死了”“理论之后”的说法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但几乎是转瞬之间，“理论”便起死回生，不但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而且从原本从被认为是恰当或者不恰当地主要寓指文学理论，似乎天经地义地演化成了同时兼指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本文拟以美国近年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线索为背景，来解析“理论批评”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耶鲁大学威廉·燕卜生文学教授保罗·弗莱，在他 2012 年出版的讲座文集《文学的理论》中，一开篇谈的便是理论。他说，理论很多地方相似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因为它提出的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而且构建体系。但是反观 20 世纪的文学理论，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恰恰是在散布怀疑主义，对传统的惯例和权威发起挑战。有鉴于这里谈的是文学理论，当然首先涉及“文学”这个概念的定义问题。也就是说，文学是什么？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弗莱指出，理论可以提供许多定义。例如从形式方面言，有循环、对称、形式性、重复等。从模仿方面言，有“自然”、心理、社会政治，以及模仿的均衡不均衡、和谐不和谐等。还可以注目于文学与其他话语之间的认识论差异，即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世界。但是哪一种话语不是竭其所能在努力反映世界呢，文学又有什么例外？假如文学反映世界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它的理论又当何为？

保罗·弗莱说他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叶和 80 年代,就开始在耶鲁大学教授文学理论导论课程。彼一时期是“理论”冷冷热热正在迅速崛起的特殊热情时期,以至于开设一门尽量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导论课程,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对“理论”的背叛。当其时,保罗·德曼也在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但是德曼将它讲解成了阐释的艺术。及至今日,弗莱说,理论曾经格外鲜艳的印记已经褪色,理论的热情也已退潮,当然方法论又当别论;但是对文学史的关注,却重又凸显出来。是以耶鲁的文学理论导论课程,倾向于跟文学批评史密切联系起来。他自己则通常从柏拉图讲到 T. S. 艾略特,或者从柏拉图讲到 I. A. 理查兹或 20 世纪早期另外哪一位重要人物,文学和批评贯穿来讲。但是,文学理论毕竟大不同于文学批评,他对此给出的说明是:

在一方面,文学批评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文学理论恰恰是缺失的。文学理论不涉及评价,它只是把评价或鉴赏当做每一位读者反应经验中理所当然的东西,如上所言,而更愿意来关注跟描述、分析和思考有关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特定的读者在特定的条件之下重视、忽视文学的价值,或者拒绝作出回答,确实就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或至少是受到理论影响的方法论研究对象?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或者不应当重视文学或哪些个别作品,这类问题则只属于批评的领域。^①

这里所说的重视或忽视文学的价值,是说即便理论本身并不明确言说价值,也无妨它指涉价值。这就像当年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菲利普·锡德尼《为诗一辩》的一句名言,“诗歌什么也不肯定,所以它从来不说谎”。弗莱强调说,这句格言保罗·德曼是会无条件赞同的,不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批评。

“理论”作为“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或者说昵称,其流行在西方文学批评界认真计数起来,已经有 40 年光景。这个昵称的奠基人之一是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早在 1982 年,卡勒在他日后几度再版的《论解构》中,就高谈阔论渲染“理论”,虽然卡勒表面上似乎是在讽刺是时独步天下的“理论”天马行空跨越学科界限,无所不及偏偏就是视而不见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文本,可是他的冷嘲热讽,反过来恰恰是推波助澜,变本加厉将理论的热情推向高潮。此书的副标题,就是《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多年以后,在他的文集《理论中的文学性》一书中,卡勒开门见山谈的依然还是理论:

理论死了,有人告诉我们。近年来,报纸和杂志似乎热衷宣布理论的死亡。学术出版物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以“高雅理论的终结”为题的文章层出不穷,著作名称如《理论之后》《理论之后的生活》《理论剩下什么》《后理论阅读》等流行不衰,难得看见乐观一些的书目:《理论的未来》或《理论大有所为》。^②

但是卡勒对理论的热情一如既往未见消歇。他指出,宣布理论死了,这里对理论的敌意固然是由来已久,但是以上标题并不是悉数出自敌视理论的作者,事实是近年有关“理论”产生的大多文字,早已经不囿于人文学科和文学,而是在竞新斗奇赶时髦。就像一首老歌唱的那样,“在肯萨斯城,一切都是最新的”。他在该书第一条注释中回顾说,当初结构主义批评登陆新大陆,尚还没来得及普及开来,转瞬之间,它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拉康和福柯,就变身为了后结构主义者。而列维·斯特劳则因为在 196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会议“批评和人文科学的语言”上,是时名不见经传的德里达突然发难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而未得荣列这个流光溢彩的后结构主义者名单。

卡勒的立场是鲜明的,那就是所谓理论死了,是有些人好高骛远,耸人听闻。他指出当今文学系里理论依然是热门课题,招聘岗位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些以往同理论少有关系的领域,如中国研究、中世纪研究等,也开始关注起了理论话语。一些话题如文学与大众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全球化影响等等,可不都是牵涉到理论。这样来看,理论就不光是堆积在学位论文中的一系列名字,如巴特勒、德里达、福柯、詹姆逊、斯皮沃克和齐泽克等,而毋宁说,不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不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美国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它们都生存在理论的话语空间之中。不过卡勒也不满今天美国出版商急功近利追逐理论的市场效益,热衷于出版各类理论导论、理论文集、理论指南,就是少见优质专著面世,以至

① Paul H. Fry,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

② 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Cultural Memory of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

于理论在今天几乎是形同幽灵。对此卡勒表明他的立场是：

与其将理论视为挥之不去的古堡幽灵，我更愿意用个平淡些的意象，把理论看做一个话语空间，今天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就是发生其间，即便我们有意来忘却它，也是枉然，一如我们试图忘却我们在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无可避免地处在理论之中。倘若说文学与文化研究中情势行将剧烈改观，那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将理论抛诸脑后，而是因为理论论争业已使我们明白，文学与文化研究从今以后应当成为，比方说，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新观点、新架构下的，同时也更为大度的历史研究；或者本身成为一种艺术实践。^①

这可见卡勒对于“理论”的一往情深。在一言以蔽之以“理论”来概括是时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各路“文学理论”大军的《论解构》出版 25 年之后，卡勒本人对于理论的热情，还是一如既往。

二、理论与文化研究

卡勒在这里强调的，依然是理论跨学科的多元性质。但是对于理论本身，卡勒给予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当年在《论解构》中，他是把“理论”界定为这样一些著作：它们不但成功挑战了，而且重新定位了本领域之外的思想。今天人们使用“理论”这个词，依然是指那些能够在本学科之外发挥影响的话语，因为它们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新概括。这些问题包括语言、意识、意义、自然与文化、心理功能、个人经验与更大结构之间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这可见举凡理论，必然是跨学科性质，是以哲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心理学、性别研究、电影理论等等，一并被融入文学与文化研究之中，是情理中事。理论具有反思性和分析性，其价值在于见人所不见，言人所未言。就文学理论而言，作为文学性质或特定文体的分析，卡勒认为今天它的功能是无奈何地江河日下、日趋衰微。概言之，今天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更被广泛使用的，正是上述跨学科的广义“理论”，而不是专门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即便今天流行的“理论”一语，按照卡勒《论解构》以来一以贯之的说法，它不过就是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呢称。

收入《理论中的文学性》中的同名第一篇文章，卡勒一开始就谈了他本人同“理论”的因缘。卡勒说，他第一次参与后来干脆叫做“理论”的相关研究，是在 1960 年代，那是结构主义的好时光。结构主义当中，就有着与日俱增的理论研究倾向，理论被认为是无所不能，可以涵盖文化的一切领域。对于结构主义批评来说，流动不居表象之下的那个深层结构，就是“理论”，它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或没有文字的各种社会，以及人类内在心理的关键所在。是以举凡“理论”，必具有跨学科性质，正是“理论”，鼓舞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等一应人文学科的繁荣。

理论之路的这个转变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说卡勒 80 年代初的《论解构》是为德里达解构主义这一当时的新潮理论做普及示范，那么到 90 年代末的《文学理论入门》，理论的示范很显然是从高深路线转向了通俗路线。例证之一，便是该书题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第三章的有关论述。卡勒以文化研究为 90 年代人文学科中最显著的事件，而且指出它同文学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一些文学教授可能抛弃了弥尔顿，转向麦当娜，抛弃莎士比亚，转向肥皂剧，总而言之整个儿抛弃了文学钻研，改事文化研究。这一切，同文学理论又有什么关系？

“理论”一语的希腊词源是 *theoria*，意谓沉思冥想、精神感知。这样来看，它的反义词是实践。英国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里对此有交代：“17 世纪，理论和实践普遍被区分开来，如培根 1626 年出版的《新亚特兰蒂斯》；此外如‘哲学……分为两个部分，即冥思者与实践者’（1657）；‘理论给人愉悦，实践则不然’（1664）；‘理论脱离实践鲜有所为’（1692）。”^② 要之，文学理论该是关

① 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Cultural Memory of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

②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viewed Edition, 1983, p. 316.

于文学的沉思冥想和精神思辨，假如它超越了文学自身，那又有什么关系？对此卡勒的解释是，理论诚然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研究，使得它充满活力，但理论并不仅仅是文学理论，它可以高屋建瓴指导文学研究，一样也可以指导文化研究。而且，有鉴于文化研究同理论一样，内涵外延错综复杂，汗漫无边，理论同文化研究的关系，说起来比它同文学研究的关系还更要亲近一点：

如果你一定要问，这个理论究竟是什么“理论”，那么回答就是诸如“表达实践”、经验的生产与表征，以及人类主体的建构之类——简言之，某种程度上就像最广义的文化。令人惊讶的是，诚如文化研究的发展所示，它错综复杂的跨学科性质、它之难于界说清楚，一如“理论”自身。^①

这可见，“理论”和“文化研究”就其极尽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而言，在当今重归“审美”的文学本位立场来看，基本上就是难兄难弟。但即便是难兄难弟，不等于没有分别。这分别在于“理论”是理论，文化研究是实践。所以据卡勒的定义，文化研究便是我们简言之称作“理论”的东西诉诸实践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来看文化研究的是是非非。文学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一如文化曾经自豪地将文学定义为它的第一载体，如今当文化研究同理论一样变得无所不包之时，究竟是文学研究可望从文化研究之中汲取新的灵感，还是面临深重危机，有可能被文化研究取而代之？这些疑问困扰中国文艺学界已有经年。论者援引相关的西方理论资源，大体也是各取所需。例如耿耿于文化研究是邪门歪道的，可以引证哈罗德·布鲁姆早在 1994 年就撰成，然而姗姗来迟，十年之后才有中译本上市的《西方正典》，这本大著号召文学重归审美传统，将文化研究的早期主流文化唯物主义同福柯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以及非洲裔和西班牙裔作家等一并发落为“憎恨学派”，判定它们刻骨仇恨“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文学。而不屑于文化研究，认为它同样已是明日黄花的，可以引证特里·伊格尔顿的 2003 年出版、2009 年中译本面世的《理论之后》。这本书里作者“文化”和“理论”并提为“文化理论”，在开门见山表明“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远去后，条分缕析它的不是。遗憾的是，伊格尔顿的这本《理论之后》，也还是同文学鲜有干系，倒不如被读作文化研究的一种政治反思。所以，它本身也还是“理论之后”的一种理论。

三、“理论的终结”

对理论的质疑与理论的一路高歌同步。早在 1982 年，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担任助理教授的特斯蒂·克纳普和他的副教授系友华尔特·迈克尔斯，就联袂在《批评探索》上发表《反对理论》一文，呼吁抵制好高骛远自娱自乐、偏偏就忽略了作品分析甚至文学本身的文学批评“理论”热。两人开篇给“理论”定义如下：

我们说的“理论”，是指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特定工程：通过诉求说清楚总体上阐释是什么东西，来主导特定文本的阐释。这个术语时而被用于文学话题，诸如叙事学、文体学、韵律学等等，却对个别作品的阐释全无直接干系。尽管这些话题也很广泛，在我们看了它们本质上是经验性的，我们反对理论的论证，将不涉及这些话题。^②

很显然，克纳普和迈克尔斯两人反对“理论”的因由，首先是“理论”不问西东，热衷于四面八方拉大旗作虎皮的跨学科倾向。我们记得这一点恰恰是同一年出版的《论解构》中乔纳森·卡勒刻意标举的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特征。

克纳普和迈克尔斯认为当代的理论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方面，一些批评家用文学作品的阅读来论证阐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有鉴于上述方法在阐释家之间存在分歧，另一些批评家就干脆投靠另一种理论，鼓吹正确的阐释根本就无有可能。两人说，在他们看来，上面两种倾向是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而这个错误说到底也是理论本身的错误。所以他们写这篇文章，不是批判哪一种理论模式，而是呼吁压根就不要去费心纠缠理论。两人的这篇文献，是最早发难理论的学院派声音。

①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2.

② Steven Knapp, Walter Benn Michaels, "Against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Vol. 8, No.4 (Summer, 1982), p. 723.

理论的大好时光宣告结束被认为早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交已见端倪。1990 年美国韦恩州立大学以“理论的终结”为题开了一次研讨会，会议提交的 17 篇文章 1996 年结集出版，该校杰里·赫伦等人主编，托莱多大学的沃乐思·马丁作序。马丁回顾说，20 世纪 70 年代，理论的敌人是文学史家、新批评家、反对派、政治活动家以及一些表达大众舆论的著名期刊，如《纽约书评》《纽约评论》等。克纳普和迈尔克斯的《反对理论》一文，则开启了一个攻击理论的新时代，坚决反对文学理论漫无准的、凭空杜撰，进而宣称批评理论整个儿就是将人引入歧途，应当彻底抛弃。对于 80 年代这段理论曾经享有的大好时光，马丁所见又有不同：

从 1989 年到 1990 年，理论预料之中地衰老加速了。一些文集纷纷面世讨论，《“理论”的状态》和《理论的局限》，以及著作如斯坦恩·霍根·奥尔森的《文学理论的终结》、托马斯·多彻蒂的《理论之后》和保罗·鲍维的《理论的结果》。但是理论诞生（1960 年代）、成熟（1970 年代）和衰落（1980 年代）的故事，并没有阻止思索之作如《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和《文学理论的不同未来》（*Literary Theory's Future [s]*）。^①

马丁开列的证据是，“理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危机四伏、四面楚歌了。“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成熟于 70 年代，衰败于 80 年代。这个概括和卡勒的美好判断，显然是大不相同的。马丁本人提供的文章是《从理论的终结到终结的理论》。他的观点是，理论日薄西山，代之而起的是批评家对意识形态和历史再度阐释的浓厚兴趣，而这也是 1960 年代之前，理论替代形式主义、成为文学批评正统时期的状态。但是形式主义也好，理论也好，它们对文学研究本身都是弊大于利，因为根据 20 世纪 30 年代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及迄至今日的老左派、新左派和新右派，文学应当坚定地建立在社会的，以及最终伦理的和政治的语境之中，唯其如此，文学的独特性才不复是空中楼阁。

马丁将理论兴起的标志，定位在 1968 年德里达的一篇文章《论人的终结》。他指出德里达本来是应约谈一谈当代法国哲学的近况，可是文章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却是在阐述如何阅读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并没有引导人走出形而上学，反而回到了人文主义的一种隐秘形式。他引用德里达该文中的话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人文主义或者说人类主义，就成了基督教、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右派或左派的人格主义，以及古典马克思主义等等的共同基础。他认为这是理论的萌生时期，显示了哲学和政治的无限循环，即每一次否定和革新，都可以被阐释为回归和压抑。理论由是观之，它是哲学的一种时间投影，在回顾过去的同时，试图将它纳入现在的、共时的构架，由此来解释将来，引领实践。

回顾 1968 年德里达那篇文献，马丁发现德里达当年对法国未来的预言，后来是准确无误地实现了。他预言理论家会“转换登场”，对此我们也至少可以枚举罗兰·巴特、福柯、德勒兹和伽塔利、利奥塔等等。四面八方都是形形色色的尼采理论，特别是在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时代。这样来看理论，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理论形式，马丁认为，普遍的特征便是共时性的分析压倒了历时性的分析。

理论的成熟时期，被马丁定位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1970 年代后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一批著述，以及 1981 年的《政治无意识》。他认为 70 年代詹姆逊面临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詹姆逊为了在他的文学批评中重写进历史和政治，不得不在至少两条线上同时出击。一方面在理论战线上，他抗击后结构主义，捍卫昔年人文主义大厦的残垣断壁；一方面在血统谱系上，坚持他从萨特、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反对阿尔都塞肢解这个体统。这个两面出击如何能够成功并且为广大读者接受？马丁感慨除非是天才或者时势造英雄，谈何容易。

马丁认为詹姆逊的功绩在于重构意识形态，由此来辩证理解历史、表征和阐释，把它们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共时结构，即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代码”中来辩证分析。同时在方法论上，鼓吹总体性。他引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的话说，如果我们不将人类经验的所有成分串联起来，设定一个单一的集体大历

^① Wallace Martin, "Introduction," Jerry Herron, Dorothy Huson, Ross Pudaloff and Robert Strozier, *The Ends of Theo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

史，那么过去和现在都将变得毫无意义。问题是，詹姆逊这样雄心勃勃地重建历史，在马丁看来是又回到了共时系统上面。比如资本主义：

虽然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却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内部，真正的变革是无从谈起的。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就像文学中示范的那样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提供了进化的表象，却是事先就辩证地标记出来了。资本主义，诚如霍克海默和后来其他许多作家所见，作为“一个社会关系的自我再生产系统”，它也许是建立在各种紧急控制反馈机制上面，通过这些机制，管理和统治自动调节来化解压力。^①

这里历史必然性的共时性模式，据马丁所见，其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即是说，倘若万事的发生都是势在必然，倘若一切皆为命定，那么也就没有可能酝酿革命，没有可能开辟其他道路。詹姆逊的总体性理论这样看来，一方面恢宏不凡，一方面自身内部反反复复游移无定。比方说批评家很难确定何以现代主义不好，后现代主义很好；或者反过来认为现代主义更好，后现代主义是退步。以及是不是万事沾染审美，就可以免遭政治历史的无情碾压？这一切也都必然导致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最终是理论的终结。

四、卡勒与克纳普

后来移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并当过乔治·华盛顿大学两届校长的斯蒂芬·克纳普，本人的专长是浪漫主义批评，1993年他出版过一本后来引起卡勒莫大兴趣的书：《文学的兴趣：反形式主义的局限》。该书导言中说，西方文学理论自柏拉图以降，周而复始在探究文学话语究竟有哪些特征，将它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或如亚里士多德所示，是因为它有着特定的主题，即人类行动的或然性形式？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像浪漫主义理论家那样，来分析所谓文学生产所特有的精神机制？或者是不是就应当追随20世纪的理论家们，尝试将文学的独特性，定位在文学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定位在所谓文学语义学的特定性质里面呢？

克纳普认为文学理论即便困难重重，也远谈不上寿终正寝。这和他当年《反对理论》中的立场，适得其反。但是理论的前景绝非一路坦途，他承认这般殚精竭虑，将文学理论与其他理论，或者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判然分离开来，实际上是困难重重，几无可能。其结果不过是推波助澜，在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当中证明所谓的文学独一无二的特质，不过是镜花水月。他说：

所以经常有人指出，比方说，本世纪早些时候新批评家和其他“形式主义”批评家用狭隘的学院术语，对文学与非文学话语做出区分，目的是鼓励英语系及其相关出版工业的突飞猛进大发展，为它们提供合法性辩护。从更广泛的政治角度来看，是意在为一种被理想化的文化活动提供辩护，将它从社会冲突中孤立出来。^②

这段话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那就是我们对文学理论的期望过高了，要它独自化解社会矛盾，担纲社会进步，文学肯定是力不从心的。这使文学理论被寄予莫大期望，从而面临窘境，这也是“理论”的窘境。

但是克纳普上述否定性阐述其实是他的修辞策略，他最终虚晃一枪，反过来为文学的独特性，同时也为传统的文学理论作了肯定性辩护。这辩护在乔纳森·卡勒看起来有点出人意料。是以在《理论的文学性》这篇文章里，卡勒以大段篇幅同克纳普打起了笔仗。卡勒没有忘记克纳普正是当初发难理论的始作俑者，是《反对理论》这篇发难文献的两位作者之一，何以11年之后，反过来肯定了文学理论的独特性？他注意到克纳普《文学的兴趣》一书扉页上印着这样的话：存在着文学话语那样一种特殊东西吗？它跟其他思想和写作模式判然不同？是不是文学作品表达事物的方式，换了另外任何一种方式都无能为力？这样一种本能认知可有什么途径来加以辩护吗？这些问题好像是明知故问说反话，然而叫人大吃一惊的是，克纳普居然都做了肯定回答。文学就是一个所谓叫做文学的东西，文学的独特性确凿无疑，文学确实与众不同。这些问题克纳普最终都作了肯定回答，委实叫卡勒始料不及。

① Wallace Martin, "Introduction," Jerry Herron, Dorothy Huson, Ross Pudaloff and Robert Strozier, *The Ends of Theo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9.

② Steven Knapp, *Literary Interest: The Limits of Anti-Form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

当初反对“理论”的先锋如今反戈一击，固然是出乎意外，但是克纳普将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寄托在“文学兴趣”上面，其阐释理路却叫卡勒不敢苟同。卡勒指出，克纳普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要高过对作者意图的兴趣，但是文学的独特性并不在于文学语言之中，而是在于将内容铸入一个同作品自身语言和叙述结构难分难解的新“场景”。是以作品的内容由外到内，将阐释问题转化为文学兴趣的资源。这也就是说，只有当阐释问题不光成为兴趣的资源，而且这兴趣同作品独特文学性之独特复杂结构同步起来，它们才成为了文学兴趣的资源。

说明这一点，卡勒举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一首两行诗，《秘密端坐》：

We Dance round in a ring and suppose,
But the Secret sits in the middle and know.
(我们围一圈跳舞边猜想，
但是秘密坐中央悉尽知详。)

卡勒说，这里的问题是，“诗人这里在说什么，又在做什么”？一旦这个阐释问题转化，来探讨说话人或诗歌所为，跟诗歌内部虚构人物“我们”和“秘密”所为之间的关系，它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学兴趣的资源了。诗歌里，我们跳舞猜想和“秘密”端坐知详适成对照。那么诗歌本身对这对照持什么态度？它是在嘲讽人类行为的徒劳吗？但是探问诗歌本身的立场，我们也需要了解诗歌自身是不是参与了跳舞猜想和端坐知详。诗歌自己到底是在猜想呢，还是悉尽知详？卡勒承认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复杂。诗歌很显然是无所不知，可是作为一个语词结构，它除了表达人类的猜想行为，还可以是别的什么东西吗？卡勒说：

倘若我们来问诗里“知详”的地位是什么，可以发现那个被认为无所不知的主体“秘密”，是修辞和猜想活动的产物，使它从“知详”的对象，变成“知详”的主体。所谓秘密，是指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东西。诗歌这里大写“秘密”又把它拟人化，通过转喻，使它从被知详的位置，移位到知详者的主体位置。知详者故而表征为修辞猜想和假设的产物，修辞猜想使知识（某个秘密）的客体，变身为它的主体（“秘密”）。^①

卡勒的论证有些纠结，但意思是清楚的。那就是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这首诗说秘密无所不知，可又同时表明这是修辞猜想的行为结果。言语必有所作为，诗也不例外。他不满意的是克纳普将文学的兴趣定位在文学的内在结构上面。假如依照克纳普的观点，那么怎样来读弗洛斯特的这两句诗呢，卡勒自己也来猜测了一番。他认为，克纳普会主张这里的文学兴趣，是处于弗洛斯特在诗里履行的行为，和诗所表达的行为之间。弗洛斯特本人他倒是在跳舞猜想呢，还是坐在中央，胸有成竹？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们难以确定弗洛斯特如何站边，是不是一如难以确定“我们”和“秘密”之间的迷离关系？

卡勒认为这就是克纳普的方法问题所在，即通过强调作者意图，引导我们来探究弗洛斯特在做什么，而不是诗歌在做什么。他认为克纳普的方法既于事无补，也没有必要。更中肯的做法应当是探究说话人或者诗歌本身在做什么，由此来考察它与诗歌中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批评和阐释的中心应当是文本，而不是作者。是以虽然克纳普也暗示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兴趣通常要高于对于作者意图的兴趣，然而终究还是将文学的独特性，定位在了错误的地方。这当中涉及到的文本、作者和阐释，那将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结语

美国批评家文森特·里奇 2014 年出版过一本篇幅不大的《21 世纪文学批评》。该书分为十章，标题分别是《我相信什么，为什么》《反理论》《批评阅读的使命》《理论的今天和明天》《理论十字路口》《法国理论第二春》《雅克·德里达第二春》《再谈后现代主义》《21 世纪理论所好》和《理论展望》。光从这个目录看，理论在当代西方前沿文论中就占据着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关于为什么要用“理论”一

^① 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Cultural Memory of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8.

语来概括 21 世纪方才显山露水的文学批评走向，里奇的解释是，因为当代各家各派的文学批评，大都就是源出于理论，他找不到别的更好的语词来替代“理论”：

我想不出有其他语词。“文化研究”是像是个挑战者，可是它不合适；它的形态太不确定，何况它缺乏历史基础和“理论”的精确性。相比来看，“理论”是一个中性术语，而“文化研究”先天带有一种模模糊糊勾连社会科学的倾向。^①

这是说，“理论”作为文学理论的呢称，虽然随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边界的日益模糊，甚至出现尝试将“文化研究”与“理论”等而论之的倾向，它依然还是独一无二的正在形成的新兴学科。即便是边际更要广泛、更要模糊的“文化研究”，挑战“理论”的名义，也还是力不从心。如前所言，理论具有历史的传统，更具有哲学的基础和背景。仅此而言，理论本身作为批评叙述的对象，应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本模态。过去 40 年里美国文学批评围绕“理论”是是非非的纷争，该是最好不过显示了这一点。

在我看来，里奇的上面这段话，毋宁说是再形象不过地概括了“理论”在今天人文话语中的现状。理论本应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具有势不可挡的王者风范。理论来自实践，但是它的目的不但是归纳实践，最终还期望能够引导实践。虽然结构主义以降，文学理论日趋玄虚，一如刘勰《文心雕龙》里的描述，“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不但高蹈，而且诡秘，无所不顾就是偏偏视若不见本该是它批评对象的文本。这使得当年卡勒原是反讽加上自嘲，戏拟“理论”一语来概括各路大军奉献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文学理论”，却是一语成谶，阴差阳错地开辟了一个风生水起的“理论批评”传统。上面里奇将理论与文化研究比较的意义，由是观之，便是几乎在同时崛起的文化研究已经星火燎原，确立了它跨科学性质的准学科地位，“理论”在它历经浴火，重发青春之际，建立“理论批评”这样一门与实践结合更为密切的关于理论本身的学科，当不是奢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5 年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5ZDB08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曦）

On Theory Criticism

LU Yang

Abstract: Theory criticism takes literary theory (in its general sense) as its narrative and descriptive object. According to some critics, instead of establishing a commending height,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ast century disseminates nihilism. Theory often parallel to criticism, however, as Paul Fry indic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at what criticism takes for granted is exactly that which literary theory missed. As a central figure among controversy over the “theory”, Culler keeps his theoretical enthusiasms along since he invents the nickname in *On Deconstruction* till his reiteration of theory in his *The Literary in Theory*. His critique of Knapp is but a brief episode. Theory never dies. In the wake of its treacherous journey, we face the right moment to vision a new discipline called “theory criticism”.

Key words: literary theory, theory criticism, the end of theory, Culler, Knapp

^① Vincent B. Leitch,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Bloomsbury, 2014, p. vii.